

同样会引发民族主义情绪，在很多情况下，民族主义情绪可能是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或者一种因素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另一个因素上得到更多反映。康纳（Walker Connor）曾提出：“观察者往往未能感受到种族民族主义倾向的抽象本质。因此不难理解，在研究某一族群不合的实例时，研究者更倾向于从易于识别的特征来对其进行分析。因此，乌克兰的动荡往往被解读为抵御俄语入侵、维护乌克兰语的努力。”他进而质疑，“语言是乌克兰民族认同的基本要素呢？还是语言其实是一个次要要素，只是在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斗争过程中，上升为民族的象征？”他的结论是：“即使语言、宗教、经济地位，或者其它任何可以识别的文化特征都发生巨大变化，民族认同也许会依然存在。”¹当然，民族认同不等于民族分离主义，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当然会有自身的民族认同。这里，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解读 Walker Connor 的上述观点：少数民族本身的语言、宗教、经济地位（当然是提高）等的巨大变化未必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决定性要素。从这个意义来说，或许可以对前苏联在语言政策领域的失误归纳如下：过分重视语言的作用，以致超越宪法授权，希望通过推广俄语来加速民族融合的过程，但反而引发少数民族民族情绪的激烈反弹，强化了业已存在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成为前苏联解体的文化因素之一。

【译 文】

《多民族国家：列宁与斯大林时期的帝国和民族构建》²

A State of Nations: 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Ronald Grigor Suny & Terry Martin 主编

Introduction（导言）

Ronald Grigor Suny & Terry Martin 著，孙昉译³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历史研究者曾经热衷的关键词汇已然转变。“国家”和“社会”，“知识分子”和“贵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曾在一系列的论辩中被交替审视。但随着学者开始质疑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ies)的相对稳定性，并且思考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范畴时，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认同、叙述以及意义。在此过程中，此前研究中适用的关键词汇就出现问题了。历史学家们对阶级利益越来越丧失兴趣，而民族——这一之前关注度少得可怜的话题，转而成为新的研究焦点。在数十年的俄罗斯中心主义（Russocentric）“垄断”之后，为数不少的历史学者开始关注非俄罗斯的其他周边群体，或是研究针对其他民族（nationalities）的“宗主”政策（metropolitan policy）。本论文集集中，帝国、民族与国家是各项研究的关键词，学者借以探索苏联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权威的代理者。编者和作者一直希望能够对苏联这个多族群国家的历史进行新的阐释，本书即是一个开端和尝试。

作为理解东欧共产主义的尝试的一部分，有关苏联的较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发端于冷战初期。学者们争先进入“地域研究”。苏联研究与东中欧国家的研究相伴而生，被用来审视发生在这块大陆上的新的政治分裂。然而，讽刺的是，那些在“欧洲的其他部分”辛勤耕作的人通常将自己

¹ Walker Connor, Nation-Building or Nation-Destroying, *World Politics*, Vol. 24, No. 3, Apr., 1972, pp. 336-338.

² *A State of Nations: 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³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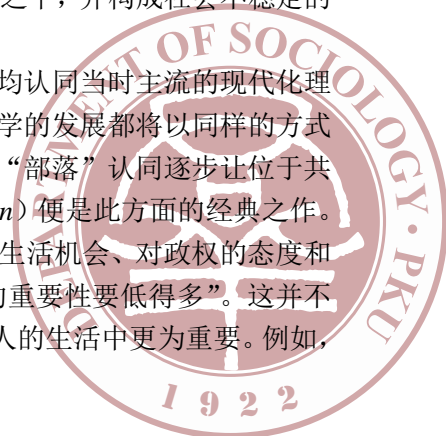


的研究限定于单个国家，“俄罗斯研究者”们倾向于只耕种自己的地盘，满足于将外围的“非俄”田地撂荒。而此后恰逢学者们研究中的男权主义倾向，有关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研究都毫无愧疚地无视加盟共和国在族群和政治上与俄罗斯的分歧，同时无意对俄罗斯性这一范畴进行解释。位于俄罗斯和苏联研究核心的是一块未被发掘的俄罗斯和非俄罗斯的民族认同史。在 1970 年代中期以前，主流“苏联学”专家关注高层政治、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而无论是地理还是智性方面的民族研究都属边缘。除了极少数例外，非俄罗斯的民族或被排除在主流叙事话语之外，或成为政治操纵和中央指令的对象，他们时而被描述为俄罗斯化的受害者，时而则是中央权威的现代化计划中遭到同情的、过时的姐妹；民族之间是同质性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区别被淡化；族群文化之间的适应性变化（mediation）很少得到关注，政治压迫和经济发展似乎足以解释苏联体制内的非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而研究多个民族往往成本高昂，在语言上也很难成行，所以研究者往往选择单个民族为研究对象。

当西方学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将目光投射到俄罗斯以外的民族时，他们的声音与声称“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苏联迥然相悖。无论是慕尼黑研究所对苏联问题的鲜明指控，还是 Walter Kolarz 或 Richard Pipes 更为温和的研究，苏联均被表述为一种帝国的安排，俄罗斯与其边疆的殖民连接。苏联作为一个帝国的概念具有相对意义，但这个帝国的特质需要更为详细的调查和理论表述。之后，在很多学者的观念中，民族是没有疑义的范畴，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本质的自然反映和表述，而民族的本质并不需要历史性解释。这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尽管并不都认同单一的帝国视角，甚至认为苏联不应该被铁上帝国标签——通过关注历史中的偶然、民族主义以及民族认同的演化特征，都涉及帝国的统治（规则）问题。

迄今为止，历史学家派勃（Richard Pipes）的《苏联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是早期最有影响的民族问题力作。由于资料丰富，对边疆的论述权威，此书成为苏联历史学者阐述“民族问题”起源的标准话语。虽然作者似乎避免作出解释，此书有一个清晰而引人注目的论辩：革命导致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斗争，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俄罗斯对非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者的军事征服。从 1991 后的视角来回顾的话，Pipes 的论述似乎被证实——中央政权对非俄罗斯的边疆进行的人为和非法的强行吞并，在中央政府疲弱的时刻被推翻，而被禁锢的人们在自由时期最终意识到了“自然的”意愿。边疆民族重新上演发生在 1917 年至 1921 年间的欲望和冲突，好像过去 70 年间苏联权力的干预没有发生一样。一面是法律和道德，一面是为了赤裸的权力而自私地操纵理想。在这个框架下，很难想象布尔什维主义所到之处并非都被认为是非俄罗斯的活动者的敌人，有时相对于个别民族精英提出的以农民为多数群体的民族独立，甚至是他们更乐于接受的选择。在内战的风暴中以及之后，革命者、“民族的布尔什维克”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建立了复杂的联盟。这种探讨苏联民族政策的视角没有涉及苏联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国家计划。事实上，在 Pipes 先驱性的著作之后，很少有苏联民族政策的研究涉及苏联 1920 年代的本土化（*korenizatsiia*）政策。但是，Pipes 对非俄罗斯分离主义者的关注提醒我们，布尔什维克继承了一系列严峻的民族问题，这些问题深藏于其所控制的政权之下，并构成社会不稳定的来源。

Pipes 的观点与他哈佛大学研究社会科学的同事们截然相反，后者均认同当时主流的现代化理论，认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业化和现代科学的发展都将以同样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社会。其中一种进路就是亚（substate）“族群”或“部落”认同逐步让位于共同的公民国家认同。Inkeles 和 Bauer 的《苏联市民》（*The Soviet Citizen*）便是此方面的经典之作。此书基于哈佛访谈项目所收集的大量资料，认为“如果要预测个体的生活机会、对政权的态度和大致 的社会政治价值观，相对于社会阶层身份这一指标，族群认同的重要性要低得多”。这并不是说民族在所有方面都无关重要。相较于俄罗斯人，民族性在乌克兰人的生活中更为重要。例如，



两倍于俄罗斯人的乌克兰人同意在莫斯科投掷原子弹！然而，这项研究证明了苏联社会是相对稳定的，民族问题并没有威胁到这种稳定。

现代化模式在 1960 年代非常流行，很多学者认为用之描述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要优于竞争性的极权主义模式。事实上，在 1960 年代，苏联常被视为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替代模式。两位英国学者 Alec Nove 和 J. A. Newth 在反思 1960 年代对“发展”问题的讨论时，将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与其南部的邻国相比，认为对于苏联南部的加盟共和国来说，在与俄罗斯的联盟中他们是绝对的受益者。有证据证明这些地方，特别是中亚地区的工业化得到了俄罗斯的经济援助而非剥削。尽管不愿将这种关系视为中央对边缘的“殖民”，Nove 和 Newth 指出莫斯科掌握着决策权：“因此，如果我们不能以殖民主义指称现存的关系，我们应该发明一个新的名称来描述这种从属的，但在本质上不同于此前的帝国主义的事物。”

无论是对苏联民族政策大体上消极的或者更为正面一些的评价，苏联学研究经常被对苏联实践的激烈的公众道德批判所型塑。个别研究者更为中立和疏离的立场在其专业圈子受到质疑。不过，截至 1970 年代，对早期苏联民族政策和具体民族的研究工作都在为“范式转移”做准备，无论是对民族构建还是破坏的描述，其中都体现了逐渐从恶意的操纵、压迫和通过俄罗斯化和现代化取消民族性的故事转向保存和转型的叙述性话语。一些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深入追溯了 1920 年代的历史，其中 Zvi Gitelman 对共产党中犹太人（Jewish Sections）的分析和 Gregory Massell 对苏联在中亚地区实行的妇女政策的探索影响力最大。Gitelman 和 Massell 均讲述了共产主义试图在传统的族群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故事，并且二人都发现“现代化与保存族群风貌并行”的努力最终破产，原因在于党的发展规划，和少数民族的利益以及保护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严重错位。世俗的犹太共产党人无法摧毁犹太教，而中亚本土民族和俄罗斯族共产党人则更加令人惊异地无法根除面纱和其他“封建”习俗，最终不得不奇妙地包容了传统社会。

截至 1970 年代中期，在公正的观察者看来，民族问题在苏联并未消失，反而像是成为苏联政治中的永存事实。1974 年，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发表了一篇影响力深远的文章，此文兼具历史深度和社会科学的复杂性。通过运用“话语”分析解释“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间愈加张扬的族群民族主义”，作者阐述了“在工业化和大众教育普及以及加强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展现出的强权的整合力量如何与联邦制行政架构相对抗”，“联邦制的行政架构保护了边境地区和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官方族群文化机构，因此成为“可被彰显”的民族态度的基础。通过区分“正统的（规范的）”和“非正统的”（不规范的）的民族主义，前者为制度所允许，后者则声称对意识形态保持疏离、独立以及拒斥，作者展示了共和国中本地的族群精英如何在“他们自己独特的民族遗产”中寻求“合法性来源”以及通过熟练操作被允许的“民族主义”来与民族性建立联系。在许多非俄罗斯的共和国中，族群权力和意识的巩固被“大俄罗斯持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主义以及俄罗斯对少数民族所展现的民族沙文主义”所抑制。无论此政权的政策目标是什么，事实上民族融合和民族主义压迫均在增长，并且“因党的政策而处于冲突状态”。政治学学者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在随后的十年间大量涌现，到 1984 年，Gail Lapidus 开始进入这块已被前人开垦的土地，进行她在民族问题领域的著名研究。

在始自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Elie Kedourie、Ernest Gellner 和 Karl Deutsch 的研究），直到 1990 年代中期的研究中，民族主义、民族理论界的转换逐渐成为专家学者们的流行观点。然而，苏联学专家和苏联历史学家中却很少有人对此有回应。从将民族看作是种族的古老的和自然的区分的倾向，深入发展到现代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悄然出现，民族主义的分析学者发展出了一个现代社会和文化构建的民族典范模式。新近对“民族属性”（nationness）的研究认为，诸如亲属、家庭、民族和民族国家是在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过程中建构（或发明）出来的，远非人类关系的自然组成，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以及更为宏阔的经济力量起到了形塑的作用。无论



是有害理想的产物(Kedourie)还是工业主义的功能要求(Gellner),或是日益密切的“社会交往”的结果(Deutsch),民族国家均被构想为人类干预的产物,并且这种干预仅仅于19和20世纪在普罗大众间得到了有力呼应。这些作者认为,民族主义促生了民族国家,而非相反。

在理论讨论之外,很多苏联学家未加批判地接受一种常识意义上的民族观念:一个相对可观察的、客观的现象,建立在由语言、文化和共享的神话或亲属起源,(有时包括)领土组成的共同体之上。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主义的爆发正值民族主义的新理论正在启动第二轮范式转移。大众传媒和一些学者以旧有的方式解释了这些事件,视之为被压迫的欲望和利益的苏醒,盖子被拿走(或因强力被吹走)后沸腾的水壶。然而,更为有趣的是,有一种将最新的社会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结合的倾向。政治学家 Philip Roeder 和 Rogers Brubaker 均采用制度分析,强调布尔什维克建构的民族制度和民族精英在保护民族意识以及提供允许快速民族动员的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历史学者 Ronald Suny 和 Yuri Slezkine 运用前人研究,对布尔什维克鼓励民族意识和一种原始内在的族群性的方式进行了总体阐述。然而,通常历史学家的工作要更慢一些,本书收录了有关民族问题和苏联前半段帝国时期的第一代档案研究。

布尔什维克不仅从旧政权中继承了“民族问题”,也接过了国家和官僚体系处理民族问题的传统:一些处理方式或者干脆忽略民族问题。因此,本书以 Ronald Suny 对革命前俄罗斯所实施的帝国式的、民族策略的统治进行的宏阔分析为开篇。Suny 勾画出了帝国的纯粹类型:存在(employ)族群区别和阶层不平等的混合政权。随后他运用此模型将海外帝国与较少得到研究的陆地帝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相区分,前者作为宗主国的民族-国家控制着地理上分离的殖民地,后者如俄罗斯、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其中帝国的和殖民地的人民趋向融合,帝国和民族认同的区别随之更加模糊。此外,鉴于俄罗斯的落后,19世纪民族主义出现之前,沙皇在语言和文化同化方面的成就要远低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西方君主制国家。因此,在沙皇为数不多地几次开展俄罗斯化时,结果遭遇到帝国的西南边疆——波兰,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更为先进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坚决抵抗。Suny 最终结论认为沙皇俄国没能从宗教、王朝或政权认同中自主地发展出强大的、连贯的、被广泛接受的民族认同,这也导致其政权在一战的强大压力下于1917年崩塌。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彼时,他们接管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多族群国家,西部和南部边疆的民族主义运动势头凶猛,东部较为温和,中部人口最多的俄罗斯族民族意识则相对较弱。尽管 Terry Martin 谈到列宁和斯大林对国家所面临形势的理解大不一样,但他们都震惊于奥匈帝国的崩溃,加上三年艰苦的内战,都认为民族主义是严峻的威胁,认为格外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力量,将会引发其他民族的保卫性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威胁国家统一,因此有意尝试建立一个反帝国的国家,或者用 Martin 的话来说,一个“肯定性行动的帝国”(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他们支持非俄罗斯的地区、精英、语言和文化制度的创建和发展,同时压制俄罗斯的民族制度和文

化,后者甚至成为替罪羊。他们相信这种策略能够消解民族主义,同时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高度干预的、多族群的社会主义国家。布尔什维克保持了 Ronald Suny 在所有的帝国中发现的族群区分原则,但是颠覆了传统的族群等级,在其中“建立了国家的民族”(state-bearing)的声誉远高于“殖民地”人民。以此种方式,他们希望在后帝国时代的民族主义时期,依旧能够保持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完整。

许多分析家都困惑于苏联领导人努力在苏维埃联邦层次上建立民族认同,然而最终失败的结局,民族被限定在亚层次。与英国、南斯拉夫、印度、美国不同,“苏联”从来没被认为是一个族群或民族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被看做是延续了 Suny 所谈到的沙皇民族国家构建模式。但是,Joshua Sanborn 告诫读者不要将民族(nation)与族群(ethnic nation)混为一谈,也不要认为在沙皇帝国和苏联中,统治者找到了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国家而非帝国的或族群国家的基础。尤其



是，面对艰巨的征兵和战争动员的任务，现代化的军队试图构建非族群的民族凝聚力。沙皇和苏联军官都用家庭的比喻建立士兵之间的亲密纽带，通过为军人家庭提供口粮将家庭和军事连接在一起。Sanborn 追溯了始于沙皇时代，伸延至整个革命时期的父权到兄弟的图式转变，后者强调团结，平等和忠诚——与国家（nationhood）的主题词呼应。Sanborn 的分析表明，苏联政治共同体的建立与其它国家的构建过程相类，即使它抛弃了“民族”这个关键术语。

Daniel Schafer, Adeeb Khalid, Matt Payne 和 Douglas Northrop 运用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独道地阐述了苏联政府对民族领土、精英、语言和文化形成的支持性政策，以及意料之外的社会后果。Schafer 研究了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建立和解体，展示了新起步的族群领土化过程之复杂和模糊性。他的文章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此前学者对苏联分而治之政策做出的评价。与谨慎的、深谋远虑地将穆斯林民族彼此分离不同，尽管出于对民族领土的大致承诺，内战时期的苏联政策此处看来更像是即兴而为。其中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并非针对突厥人的民族构建，而是反对整个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Schafer 并不认为苏联精英工具性地构建了巴什基尔认同，相反是源于巴什基尔的游牧传统，他们对土地的共享权利以及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与中亚一样（见 Khalid 的文章），巴什科尔托斯坦的政治较量呈多极化，当地巴什基尔人，当地俄罗斯共产党，中央苏联政权，白人力量和俄罗斯定居者都提供了上演欺骗、误解和倒戈这些所有可能性的情境。Schafer 的文章还展示了在多族群杂居地区，民族领土的形成如何成为族群动员和民族意识急剧增加的来源。1917 年前，巴什基尔认同或许是微弱和潜在的，但一旦布尔什维克政策支持民族领土形成，巴什基尔领导人 Ahmed Zeki Validov 便受到广泛欢迎。这主要是由于巴什基尔认同中一个主要信念：我们不是鞑靼人。在 1920 年代，数万计的民族领土建立，其中许多小到一个村庄。Schafer 所描述的发生在巴什科尔托斯坦的事件在整个苏联境内反复上演。其结果不仅是统治者意愿之外的民族意识增长，还带来了其更不愿看到的族群冲突和民族动员的发展。

Adeeb Khalid 将我们的关注点从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突厥穆斯林民族引向与之截然不同的中亚突厥穆斯林，同时话题也由民族领土转向民族精英。早前的学者多运用土耳其语的研究文献质疑俄语研究，Khalid 则从通常的俄罗斯与穆斯林相互对立的叙述角度转向一个多极化的故事：Jadids（穆斯林改革者）与保守的穆斯林乌理玛（Ulema 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中亚俄罗斯人对穆斯林的袭击，本地俄罗斯人占统治地位的苏维埃政权与莫斯科的冲突，以及 1919 年以前苏俄与激进化的反帝的 Jadids 之间的战略性同盟。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桩便利的姻亲提供的珍贵的受过教育的中亚人满足了彼时其新成立的民族领土的人事需求，而在与保守的穆斯林反对者较量中败下阵来的 Jadids 也需要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以获取实施改革理想的政治权力。在 1920 年代的整个苏联，伴随着 Schafer 的民族领土化故事，Khalid 的故事也以不同形式频繁上演。最终，在每个加盟共和国，布尔什维克都能找到受过教育的，合格的且按政策规定只能由非布尔什维克的民族（通常是民族主义）精英担任的国家“干部”，同时在莫斯科新的激进的统治之下，本地的民族主义者为其民族构建计划建立了令人惊异的同盟。然而这桩婚姻并不平等，当布尔什维克成功地教育和培训了新的忠诚的非俄罗斯的精英时，他们逐步摆脱——在很多案例中，逮捕了一早期的盟友，这发生在 1928-1930 年，1932-1934 年和 1937-1938 年的清洗运动中。对民族精英的盟誓，尽管坚持到了斯大林时期及其后，但却不是民族自治，甚至不是“民族共产主义”的许可证。

Douglas Northrop 有关乌兹别克斯坦的性别和族群性的研究强调了民族文化和苏联“文化革命”的复杂性。Sheila Fitzpatrick 借用这个布尔什维克短语，以指称 1928 年至 1931 年间斯大林所发动的“社会主义进攻战”，其内容包括快速工业化、取消私企和民间贸易，农业集体化，以及公共、学术和职业各领域的彻底革命化。文化革命不仅指一种途径——阶级斗争和鼓励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支持者们的自治行动——同时也是一种情绪：一种广为传播的坚信落后的社会很快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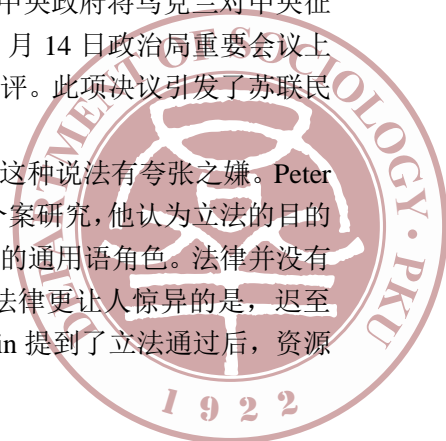


能通过革命而一跃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乌托邦信念。没有什么比布尔什维克自己的宣传更贴切“文化革命”意涵的了，用当时的语言说，“文化上落后的东方的”民族地区。Suny 的文章表明在民族主义时代，帮助“落后的”殖民地文化发展是一种典型的晚期帝国主义获取合法性的行为，因此苏联的肯定性行动将发展主义进行得如此极端也就不足为奇了。Northrop 谈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对苏联政策的激烈对抗。乌兹别克族以性别不平等和被视作落后的、肮脏的和压迫性的妇女隔离为特征。为了使苏联东部尽快现代化和文明化，共产主义不得不消除这些对民族认同而言具本质特征的社会实践。这就给了那些抵制苏联现代化的人以“民族”的旗帜为理由武装自己。Northrop 叙述了苏联试图渗透并改变乌兹别克的性别关系的行动，向我们展示了即使是被视为最暴力和“集权主义”的国家行动在改变日常生活传统模式中遭遇的困境。

Matt Payne 提供了一个哈萨克斯坦地区布尔什维克民族精英形成早期的个案，该个案虽出人意料却颇具启发性。在 1920 年代，作为其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倾向招聘工人来担任原有的和不断新设的政府行政工作。然而，在哈萨克斯坦和许多非俄罗斯地区并没有本地无产阶级，因此，吊诡的是，民族精英形成的第一个阶段是无产阶级化。在建设土西铁路（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时，政府倾向于雇佣哈萨克工人。但是，将游牧民族转变为拿薪酬的工人这一举动遭到了传统的哈萨克人、土西铁路管理者和欧洲工人的抵制。对哈萨克族的倾向性政策激怒了非哈萨克工人，歧视、族群成见以及对有限的工作和利益的持续竞争，导致了激烈冲突、凶残斗殴甚至社会骚乱。Payne 笔下的此类事件在苏联东部的民族地区很常见，虽然其它地区的冲突没有像在哈萨克斯坦那样激烈和复杂。在充满敌意和困难的情况下，新形成的哈萨克无产阶级在老练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俄罗斯工人中找到了同盟，后者以其仅能做到的方式帮助他们适应新形势：即教育他们成为语言和文化上的“俄罗斯人”。因此，苏联政府完全出于培养哈萨克无产阶级的行动，其结果却产生了强有力的俄罗斯化（Russification）。虽非本意，但从苏联的视角看，这一结果并非不受欢迎，因为苏联获得了这些“哈萨克人”兼“布尔什维克”，其中很多人将在哈萨克政权中担任要职。

1932 年文化革命结束之后，社会和文化政策趋于保守，在一系列变化中，进步教育的衰落，堕胎非法化，以及艺术由先锋转向现实主义较具代表性。这段时期内苏联的多族群统治政策也发生了根本转变，部分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政治的保守趋势。然而，正如 Schafer, Khalid, Payne 和 Northrop 列举的那样，此种情形也源于苏联早期政策所造成的紧张局面和意料之外的后果。**族群领土化的本意是消解民族主义，但其实质却加强了民族主义，加剧了族群冲突。**对少数族群的优惠政策（肯定性行动）也有类似后果。苏维埃的发展主义在中亚遭到的是抵制和反抗，而非感激。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策略性的族群性现象，其中个人利用其民族认同获得好处，同样也是布尔什维克不乐见的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而非理性行为。这些问题都是现代的多族群国家所特有的；民族问题应该被管理而非解决。然而，布尔什维克并不这么认为。或许最让斯大林担忧的，是他越来越相信与民族精英的联盟会导致布尔什维主义的民族化（nationalization），而非各民族的布尔什维化。在 1928-1933 年的大饥荒中，此种怀疑达到最高点。当时，中央政府将乌克兰对中央征粮的抵制，解释为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发展的后果，并在 1932 年 12 月 14 日政治局重要会议上通过了斯大林亲自修订的方案，对实施乌克兰化过程中的错误进行批评。此项决议引发了苏联民族政策的重要调整。

学者通常认为此次变化标志着本土化的结束以及转向俄罗斯化。这种说法有夸张之嫌。Peter Blitstein 对 1938 年通过的非俄罗斯族学习俄语的法律进行了详细的个案研究，他认为立法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现语言或文化上的俄罗斯化，而是强化多民族国家中俄语的通用语角色。法律并没有取消民族语教育，只是规定小学教育中俄语为必修课。比通过这项法律更让人惊异的是，迟至 1938 年，在相当多的非俄语学校中，压根没有俄语课程科目。Blitstein 提到了立法通过后，资源



投入的匮乏导致了糟糕的俄语水平。此外，苏联教育中有另一项更为重要的，实施至斯大林去世前的语言政策：要求各命名民族（titular nationals）（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族，鞑靼斯坦的鞑靼族）去本民族学校学习。尽管在实践中此项政策经常不能严格执行，但只有到了后斯大林时期，随着 1958 年的学校改革，非俄罗斯族的孩子才有机会接受俄语教育。斯大林时期的教育制度很可能妨碍了语言上的俄罗斯化，在赫鲁晓夫和勃日列涅夫时期，为了让孩子将来的社会发展更为顺利，成千上万的父母将子女送入俄语学校。

David Brandenberger 的文章讨论了 1932 年 12 月政治局决议之后发生的最为戏剧性并在二战时期得到强化的现象：俄罗斯传统文化复兴以及俄罗斯族被视作苏联的领导民族，“兄弟势均，长者为先”（the first among equals）。Brandenberger 将此解释为政权构建和获取合法化的政策，强权（Great Power）而非露骨民族主义得以产生。在斯大林看来，最初轻视俄罗斯文化，不鼓励俄罗斯民族意识的策略没有达到创建统一政权的目标，需要一种全新的统一原则。Brandenberger 回顾了参战动员对历史的运用，对“我们伟大的祖先”（几乎全是俄罗斯族）的祈求，以及对之前受到谴责的俄罗斯帝国主义（“较少的罪恶”理论）的颂扬。一些俄罗斯中心主义的学者力图对沙皇和苏联历史做亲俄的中央集权的解释。优秀的历史学家 Anna Pankratova 和她的研究队伍写出了作为俄罗斯殖民主义关键环节的哈萨克斯坦史，却被谴责为反俄。与之同时，俄罗斯的英雄和历史在整个苏联联邦中得到颂扬，而非俄罗斯族的英雄只能局限于加盟共和国内，且其地位也不同。Pankratova 举例说到：非俄的英雄及其故事情节绝不能是反俄的，而应是支持苏联作为“人民的朋友”这个新权威的多族群形象，在其中俄罗斯占据一统地位。

俄罗斯族的地位，以及与之相伴的苏联统一原则的改变，一方面体现了 1930 年代苏联政策的新动向；另一方面标志着“敌对民族”范畴的出现，以及仅仅基于族群认同的对个人和民族恐惧的增长。Peter Holquist 的文章富有创见地探索了这种破坏性政策的根源，无论其对象是阶层，种族，族群或其他社会范畴。他向我们展示了在 19 世纪的欧洲，国家公职人员以及学者怎样开始将市民构想为集聚的人口并加以调查和统计，以方便国家对人口规模进行科学干预和形塑，Holquist 称之为“人口政治学”。这项社会性工程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形式，如苏联早期的以阶级和民族为基础的肯定性行动政策，也可能是一种“消极的”干预，用来削减、清除或消灭不想要的人群：1860 年代早期的西部高加索人；一战期间中亚一些地区的土著人；1919-1920 年间顿河和捷列克的哥萨克人；1925 年车臣的“土匪”，以及二战期间被视为叛徒的民族。Holquist 的结论指出，暴力通常被观察者当作布尔什维克的核心特征，但应该在更宽广的视角下审视暴力，应将暴力看作新的社会构想和国家干预技术的产物。

在苏联早期，民族并不是消极的人口政治的对象。哥萨克指的是反革命地区，而非族群。事实上，在 1920 年代，苏联政府对散居的族群—先是犹太人，接着是其他许多族群—实施了“积极的”迁徙政策，以便集中人口，形成民族领土。然而，在 1930 年代，一些特定民族成为消极的人口政治对象，其手段包括族群清洗，逮捕和大规模处决。主要原因是苏联试图通过积极的民族构建政策对邻国施加影响。这些邻国主要位于苏联西部边境，是芬兰人/卡累利阿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罗马尼亚人/摩尔多瓦人跨境生活的地方。在 1920 年代，苏联希望其民族政策等能够帮助芬兰、波兰和罗马尼亚等邻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进行革命。并且，此目的在相当程度上也达到了。然而，相信跨境族群关系的政治性联结暗示了影响也可能以反方向发生。随着 1930 年代极端民族主义在几乎所有的东部和中部欧洲国家取得胜利，以及苏联内部日益增长的惧外心理，苏联领导者相信一种颠覆性力量正从西方传向东方。1935-1938 年间，至少 9 个“散居”（diaspora）民族——芬兰族、爱沙尼亚族、拉脱维亚族、立陶宛族、极地族、德意志族、库尔德族、汉族以及朝鲜族被迫迁离苏联边境。1937-1938 年的恐怖时期，仅仅是基于其族群认同，政府又对以上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如希腊族和保加利亚族）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几乎



占到这两年内苏联所进行的 680,000 起处决的一半。事实上，在大恐怖的最后几个月，散居民族几乎是唯一的受害者。这是一种超常的、没有预想到的发展。

在二战期间，伴随着俄罗斯中心主义的舆论宣传，苏联的民族主义恐怖极度扩张。1941 年 6 月德国入侵苏联，德意志族很快遭到驱逐。1943-1944 年间，在德军被赶出之后，6 个民族的全部人口——所有男人、女人和儿童——因被指控外通敌军而流放到西伯利亚或中亚：克里米亚鞑靼人、梅斯赫特土耳其人、卡尔巴达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和卡尔梅克人。前三个民族讲土耳其语，可被看成是土耳其族散居人口，而后三个均是苏联土著民族。此次流放标志着苏联民族恐怖活动的加剧。随后，在成立不久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境内的苏维埃化，也导致了 1944-1945 年间的大规模驱逐。严格的说，这些倒不是民族驱逐。1918-1921 年和 1928-1933 年间，全苏联都上演着大规模的逮捕和流放事件。然而，由于战后俄罗斯族不再是驱逐对象，并且苏联此时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将自身认同于俄罗斯族的民族性，所以那些遭到驱逐的受害者们便认为自己受到了俄罗斯帝国主义权力所施加的民族压迫。

这种想法并非空穴来风。1948 年 11 月，苏联出台法律，将流放人群分为两类：暂时流放和永久流放。前者主要是不涉及民族身分的流放者，包括 1930 年代被驱逐的“地主”和 1940 年代被流放的 Vlasovites 人（那些协助德军作战的人），事实上，在斯大林去世前，这些人都是自由民。后者则包括了所有被流放的民族成员，如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西白俄罗斯人、西乌克兰人和摩尔多瓦人，尽管这些人已被作为地主、Vlasovites 叛徒或“土匪”被驱逐出境了。因此，他们的流放是民族性质的，并且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仅仅因为其民族身份被驱逐。最终，战后政府开始了对闪米特族的压迫，尽管这在苏联早期被视为反动的、反革命的、粗鲁的和禁止的。讲意第绪语的知识分子阶层被悄然指控和处决，同时，喧闹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旨在恐吓和污名同化了的犹太知识分子及被认定为其同盟的世界主义者。

1930 年代中期，舆论宣传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转向以及开始实行的民族迫害，对苏联这个多族群国家的生命力起到了主要和长期的破坏作用。正如 Mark Beissinger 令人信服的指出，在民族主义时期，“帝国”被认为是过时的人为构建，最终将分裂为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各个民族国家。因此，一个被其市民和邻国定义为“帝国”的国家通常好景不长。印度如今没有被视为“帝国”，但如果我们开始听到人们普遍这样谈论印度，我们就能推想它的分裂也会大体如此。优秀的苏格兰民族主义学者 Tom Nairn 熟谙这种关联，他花费了二十多年试图使他的同胞和全世界相信：大英帝国是人为构建的，因此难逃劫数。列宁和斯大林同样非常清楚这一点，正如 Terry Martin 的论述，肯定性行动的帝国是一种自觉地、不惜任何代价以避免主观上被视为“帝国”的策略（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empire）。1930 年代，斯大林认为付出过于高昂，但他的改革同样代价高昂。现代社会中，帝国通常与两种事物相关：民族压迫和被迫同化。事实上，斯大林的民族压迫只涉及一小部分非俄罗斯族，但却给所有的非俄罗斯族造成了帝国主义行径的印象。斯大林的俄罗斯化方式相对温和，国家支持的民族构建努力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但他首肯的好大喜功的并且常带有侮辱性的俄罗斯中心主义宣传，错误地给大众造成了政权俄罗斯化的印象，国家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失去了不少此前通过本土化和肯定性行动政策收获的民心。

如果要指出 1953 年 3 月苏联统治多族群国家的战略，认为苏联一方面追求民族构建政策，同时另一方面在向人民灌输主观的帝国观念（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empire）并不太为过。赫鲁晓夫的确结束了斯大林的民族迫害政策，尽管他只是对政策的部分后果采取了措施，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德意志人和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仍不能返回祖居地，而较为温和的抵制闪米特族的非暴力运动得以制度化。赫鲁晓夫结束了公开的沙文主义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话语，但俄罗斯族仍是“老大哥”，其影响力日益提升。勃日列涅夫领导期间基本延续了这条路线，同时越来越理性地对待民族政策。但这些改变来得太迟了，或者说政府已失去了改变的能力。如果说 1920 年代，本土



化运动是中央政府强加到不怎么情愿的俄罗斯化的共产主义者之上的，那么 1960 年代到 1970 年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大众教育的发展和民族国家构建过程，本土化运动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趋势，并且彻底造成了共产主义民族精英要求共和国自治权的局面。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1980 年代，俄罗斯族和其他命名民族（titular nationals）都相信，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之外的大多数加盟共和国中，其他命名民族（titular nationals）有更多就业和教育机会。而俄罗斯人与其通婚的后代通常登记为非俄罗斯族。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衰退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中央权威的制度性破坏，大量涌现的揭露斯大林对非俄罗斯民族罪行的出版物，使得帝国观念逐渐为人民所接受。甚至很多俄罗斯人认为本民族也受过压迫，并支持叶利钦领导的非帝国的俄罗斯取缔“苏联帝国”的运动。

苏联历史中有很多颇具讽刺的地方。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声称已超越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历史阶段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精英，最终在自己的政体内被**制度化的民族**所终结。其次，尽管对民族国家构建的支持是避免现代社会中帝国主义分崩离析厄运的一种策略，苏联最终却成为其主观的帝国观念（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empire）的受害者。苏联民族政策的双重效果——构建民族和破坏民族的双面性——在政权解体前一年的春天尤为显著，6 个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摩尔多瓦——立意要脱离苏联，而另外 9 个——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全民公决结果是压倒性的同意留在改革后的联盟中。1991 年 8 月政变失败后，苏共中央“自杀”式解体，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最后纽带消失了。最后，也是幸运的一点在于，列宁和斯大林沿着民族边界划分疆域的政策，使得苏联的解体过程进行得顺利而平和。而在违反了这一原则的地方，如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摩尔多瓦右岸，则上演了流血冲突。在一些优势民族的民族主义者转而压迫少数民族的小型帝国主义的政权内——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人民诉诸于武力。尽管去殖民化的很多方面已经在苏联境内发生，但这些政权未来仍面临建构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这一艰巨任务。

一些术语译法：

social categories 社会范畴
Russocentric 俄罗斯中心主义
Sovietology 苏联学

nationness 民族属性
Russificatory 俄罗斯化
national territory 民族领土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李健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